

系谱·地图·谏书

——陶渊明辞赋的归田论述及其文化构图

许东海

(台湾政治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台北)

[摘要] 陶渊明运用辞赋文体,并实际借由《归去来辞》与《感士不遇赋》两篇重要文本所展开的归田论述,就其外在型式的辞赋文体特质,臻至辞赋的书写系谱,及其内在的书写文化,例如其中包括时空铺陈、历史巡礼、人物缅怀、文化追忆、当代讽谏等等,皆一一映现在陶渊明辞赋之归田论述里,因此借由攸陶渊明辞赋中归田论述之历史系谱、文化地图与人生谏书等三类文化范畴的重新审视,我们得以重新观照并发现其中所蕴涵的深层文化底蕴,并由此展现辞赋书写在陶渊明田园文学世界中独特的文体、文化及其人生对话意涵。

[关键词] 陶渊明; 归田; 历史系谱; 文化地图; 人生谏书

[中图分类号] I222.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4799(2013)02-0035-08

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田园诗派的开山宗师,其诗作已成为历代田园文学的主要代表文类。然而倘若回归陶渊明本人的创作世界加以考察,则不难发现三则值得关注的现象:(一)陶渊明丰富的田园诗歌固然居其创作之大宗,但他同时别采辞赋或记体等其他文类书写田园;(二)陶渊明以辞赋书写田园的作品,自辞赋史上而言,不仅前有所承,并且其中不乏变创;(三)陶渊明借由辞赋书写所展开的归田相关论述,并非全然简单地以归田主题作为命题纲目,例如除一般后世读者所熟悉并视为经典之作的《归去来辞》之外,另一篇以“士不遇”主题书写的《感士不遇赋》,其实即宜视为作者运用辞赋体现归田论述的另类变创。此赋对于审视陶渊明田园诗如《归园田居》、《饮酒》等等的创作心理,具有参考价值与意义,尤其对于作者辞赋书写所展开的归田论述而言,实与《归去来辞》具有互为表里、相辅相成的对读意义。

一、归田系谱:《归去来辞》、《感士不遇赋》的赋学源流及其文类转换

陶渊明《归园田居》、《饮酒》、《咏贫士》等组诗系列成就了其田园宗师的崇高历史地位,然而如是深具田园文学经典意涵,从文学传统的渊源流变而言,显然并非凭空出现,而是其来有自,适如与陶渊明时代前后相近的晋代挚虞《文章流别论》、齐梁刘勰《文心雕龙》及钟嵘《诗品》都映现魏晋六朝当代文学与传统经典脉络之间相关历史承传及系谱意涵,并且如是文学辨体及其系谱意识,诚然映现魏晋六朝文学观照浓厚的历史精神取向,由此审视陶渊明辞赋的创作缘起,亦充分展现这一当代文学与文化观照。例如《感士不遇赋》、《闲情赋》的前序皆高揭此一创作旨趣: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得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遂感而赋之。^{[1]448}

初张衡作《定情赋》,蔡邕作《静情赋》,检逸辞而宗淡泊,始则荡以思虑,而终归闲正。将以抑流宕之邪心,谅有助于讽谏。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固触类,广其辞义。余园间多暇,复染翰为之。虽文妙不足,庶不谬作者之意乎?^{[1]448}

由上述两篇赋篇序文所述,皆开宗明义地揭示作者追本汉赋作者,并承传两汉“缀文之士,奕代继作”的书写意涵,从而以触类广义的书写姿态,体现出其辞赋创作背后深刻的历史意识及其赋学系谱意涵。

至于陶渊明另一篇直接以“归田”为主题的《归去来辞》,虽未如前引《感士不遇赋》、《闲情赋》高举其古今文士迭代传承的辞赋书写系谱,但从《归去来辞》序文所揭示的重要归田书写转换,例如“怅然慷慨,

[收稿日期] 2012-10-26

[作者简介] 许东海(1959-)男,台湾基隆人,台湾政治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辞赋学、汉魏六朝及唐宋文学研究。

深媿平生之志”、“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乃至归田想望铺陈中之“乐琴书以消忧”、“登东臯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等田园叙写,审视其间主要旨趣,实与张衡《归田赋》所引领风骚的归田论述彼此深契,例如:

于时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鸪鹳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嚶嚶。于焉逍遥,聊以娱情。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闲之逸禽,悬渊沈之魮鮪。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2] 243-245}

张衡以仕途告退与耕读园田为创作旨趣的《归田赋》,诚为中国归田文学的重要发轫,并成为梁昭明太子萧统《昭明文选》志类赋中的经典示范,兹此而下如西晋潘岳的《闲居赋》皆其“缀文之士,奕代继作”,并渐次建构归田系谱的重要成员。此外借由《昭明文选》的传统文学经典选录,其实适为六朝之前辞赋所开启的归田论述及其文学系谱,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脚注。而昭明太子萧统本人正是六朝当代田园诗宗陶渊明的重要知音,同时又为其编纂文集。另外,张衡《归田赋》固为萧统所推崇,亦必曾为熟稔西汉辞赋的陶渊明所赏读,《归去来辞》正是以辞赋文体展现其归田论述之作,何况前引陶潜《闲情赋》序篇首即首揭其赅续张衡《定情赋》以下书写系谱。由上观之,陶潜《归去来辞》基本上应主要承传自张衡《归田赋》所引领的归田辞赋系谱,可见张衡辞赋对于陶渊明辞赋的重要启迪意涵,其中除了皆以“归田”命题,并同样运用辞赋载体。因此,除外在若合符契的书写“形似”特质外,两篇辞赋中所标榜的儒、道合流的玄学意趣及其田园生活范式,亦大体如出一辙,从而进一步证实两者之间在归田辞赋书写史上,借由古今遥契的重要传承关系,所渐次形塑的归田书写系谱^{[3] 53-55}。

《归去来辞》是陶渊明辞赋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他以辞赋正面演绎归田论述的主要文本。相形之下,《感士不遇赋》则展现了作者归田论述的变创书写策略,基本上两者之间的文化网络密切联结,主要映现为源自汉赋以来作者对于传承儒家学优则仕的士人精神,于其平生志业追寻历程中,对于象征实现梦想的京城场域,一种由趋附到偏离的心路转折^[4]。因此若由归田论述的面向加以观照,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则映现为一种正面且表层的论述策略;反之,《感士不遇赋》则为其辞赋归田论述提供了另一种侧面却又深层的文化脚注。由此沿波讨源,不难发现汉赋中由张衡《归田赋》所引领风骚并沿此遗风出现的仲长统《志论》赋体杂文,与晋代以下潘岳《闲居赋》、张华《归田赋》等等同一主题系列,所渐次形塑建构的归田书写系谱。这与汉赋当中以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为代表的“士不遇”主题书写系谱之间,原本彼此平行、各自为政的辞赋系谱及创作关系,首次同时汇集在同一作者身上,并且进一步形成经纬交织并互为表里的论述结构,从而展现了作者归田论述既传统又富于新变的辞赋书写策略。

陶渊明辞赋如是新变的归田论述,其中关键正得自于他巧妙融合在汉赋世界中,原先彼此自成系谱的“士不遇”与“归田”书写,并由此进而加以整合。因此,陶渊明田园文学所重新缔建的辞赋归田论述,其中主要的文化基因明显渊源于汉赋之中,却又孕育出深具变创意涵的陶渊明式归田论述特质。于是渊源于汉赋的“归田”与“士不遇”之不同书写系谱,因而二谱联宗,由是而下几乎成为中国文学中归田书写的难以切割之连体婴关系,同时陶渊明此富于变创意涵的归田论述,显然成为其中动见观瞻的重要创作里程碑,从而树立起其在田园文学系谱上的宗师地位。由此观之,陶渊明田园诗人之宗的地位,固然主要植基于经典而又独特的田园生活体验,与其丰富自然的田园诗歌特色,然则他以《归去来辞》与《感士不遇赋》为代表的辞赋归田论述,其实更深刻地体现其田园文学典范背后的重要文学渊薮,显然颇得力于汉赋以“归田”与“士不遇”为主题的书写系谱及其历史传统,并且由于其融合传统与新变的内在转化,改写田园文学史上以汉赋为宗的传统归田论述及其文体脉络,并且如是经纬交织的田园论述,显然深具既复古又变古的双重文化意涵。由此观之,陶渊明经典而又独创的田园文学成就,其中关键之一,则源自陶渊明向汉赋书写系谱取经,从而映现的深刻重要历史意识及文化心理。

身为中国田园文学史上一代宗师的陶渊明,固然主要奠基于《归园田居》、《饮酒》、《咏贫士》等田园组诗的丰硕创作成果,并由此引领历代田园文学书写系谱的源远流长。然而,借由作者另一田园文学经典《归去来辞》的示现,我们得以发觉并关注陶渊明辞赋文类中以《归去来辞》为中心的归田论述,不仅是

其田园诗歌之外的文学附属与点缀,其实更为作者田园诗歌等重要创作经典的诞生,提供了内在的文学与文体的历史基因。于是构成陶渊明田园文学世界的两种文类——诗歌与辞赋,显然不仅是一种并行互补的文类排列组合关系,并且进一步借由汉赋“归田”与“士不遇”两组书写系谱的追本溯流,得以勾勒出陶渊明田园诗歌创作的传统依据与文类转换,从而展现其田园诗歌与辞赋在文学史上的前后传承与古今流变意蕴^[5];另一方面,陶渊明如是田园诗赋兼备的创作范式,也印证了他在田园文学历史系谱上融贯古今以集大成的重要成就与地位,诚然攸关其上溯汉赋渊薮,借鉴其中“归田”与“士不遇”书写系谱,进而取精用宏并出以变创之姿的书写策略,因此原来在汉赋中平行分流的上述两组主题,在陶渊明的田园创作场域里,转而成为既深具历史传承新变且兼容并蓄的文类合流及新变建构。其中《归去来辞》与《感士不遇赋》的正变取向与互为表里,建构起其辞赋世界的归田论述,从而彰显陶渊明归田论述在田园文学系谱上的重要历史流变意涵。

二、归田地图:《归去来辞》的田园风景与心灵地图

由前述田园文学书写的历史系谱考察得知,陶渊明《归去来辞》固非辞赋筌路蓝缕的先行发轫者,并且前有所承,因此借由与汉代张衡《归田赋》的初步对照,《归去来辞》对于作者的创作意识或书写策略而言,诚然具体而微地映现其中的拟古意涵,基本上与陶渊明其他辞赋作品,如《闲情赋》之于张衡《定情赋》、蔡邕《静情赋》、《感士不遇赋》之于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大体可谓如出一辙,从而深具向汉赋传统取经并摹效的拟古意涵,适如其归田组诗《拟古九首》在命题上明白揭示创作本质上的“拟古正名”。然而《归去来辞》除为中国田园文学史上归田系谱的重要里程碑外,同时又借由田园风景之铺陈宏衍,为古今“不遇”的士人群体,打造了一条足以转换轨道并安顿生命困境的可能出路,从而改写原有前进京城,实现仕宦梦想的人生蓝图。

东汉张衡《归田赋》所编织的田园生活蓝图,诚为东晋陶渊明《归去来辞》的书写原型。然而若就两篇辞赋田园书写风景铺陈对照,不难发现陶赋除了文字较诸张赋有详略不同外,尤值得关注者,乃在《归去来辞》传承之外的书写变创,从而所深切映现的归田地图与蓝图论述的异趋。

就创作背景而言,《归田赋》基本上乃张衡于东汉顺帝三年晚年时期所撰,然作者终其一生未曾实际归田,因此,此赋中的田园生活及其风景铺陈,本质上只能视为张衡缘自“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羨鱼,俟河清乎末期”下的困境隐喻与梦想蓝图,适如此赋首段所揭橥的“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这其中明显挟带“士不遇”的疑惑与慷慨,于是仲春的田园图景成为作者“玄儒”取向下的思想投影^{[6] 111-121},更进而化身为作者辞赋归田论述之一重要文化构图,例如:

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2] 746}

张衡《归田赋》透过风景铺陈虚拟田园生活的未来人生蓝图,基本上同样被复制于陶渊明《归去来辞》之中,并且更富于曲尽其微的“巧构形似”赋笔特征。于是在《归田赋》中仅初步勾勒风骨的田园蓝图,陶渊明在《归去来辞》中娓娓细诉与渐次开展的田园风景铺陈里,不仅只是一幅未来预拟的人生蓝图,更进而化身为作者迷途心灵导航与田园重返的心灵地图。其中关键乃在张衡《归田赋》中提纲挈领的田园蓝图,主要聚焦的是以山水田园之乐为中心的美丽图卷,并作为张衡一旦告别仕宦场域后,“于焉逍遥,聊以娱情”的梦幻蓝图。然而从作者平生几乎从未真正辞官归田的仕宦行迹加以观照,适足恰如其分地见证其《归田赋》之梦幻蓝图取向的田园想望,及其作为仕宦困境隐喻的文学镜像,因此张衡赋中本应逍遥娱情、乐以忘忧的山水田园乐土世界,竟出其不意地出现“触矢而毙,贪饵吞钩”的突兀笔墨,婉转映现作者心灵深处挥之不去的仕宦阴霾,从而见证《归田赋》“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的最终论述旨趣。由此观之,张衡《归田赋》的田园蓝图建构旨趣,主要体现为仕宦困境本质的文学隐喻,然则却不宜视之为作者自我召唤归田,并付诸身体实践的精神地图。因此张衡《归田赋》与陶渊明《归去来辞》的田园归返书写,一方面固然构成田园文学史上递相祖述的系谱序列关系;另一方面却也决定了二者由并肩而行的形似姿态,终致貌合神离而分道扬镳的归田书写底蕴。

对张衡而言,归田蓝图的书写旨趣主要集中在仕宦困境的情志出口与文学隐喻,因此当作者撰成《归田赋》之后,并未曾以其身体行动践履所预拟的田园蓝图;反之,尚且一往如昔地置身于仕途之列,于

是对于终其一生宦海浮沉的作者而言,《归田赋》中的田园蓝图最终只是一幅虚拟本质而未曾实践的蓝图^{[4] 53-55};相形之下,陶渊明看似依张衡《归田赋》拟作的《归去来辞》,其中固然不免复制张赋中田园蓝图的基本元素,却益形铺陈其中的自我对话与归田动线,体现陶赋跨越张赋以田园蓝图为主的基本旨趣,进而转化为深具身体践履意涵的归田地图意涵。

《归去来辞》的风景铺陈重点,并非单纯在张赋原有的田园蓝图上展现语言艺术上的铺采摘文,而是详瞻地为自己的归田实践做具体而微的规划。例如,正文篇首开宗名义的自我对话与归田告白: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1] 460}

陶赋贯穿始末的田园风景铺陈之际,往往映现告别为昨日仕宦迷途,并借由如是不一而足的告白与对话,作为折返田园之旅的情志忏悔与文化救赎。对照于张衡《归田赋》田园风景中“触矢而毙,贪饵吞钩”的昨日仕宦困境的召唤与回首,陶渊明《归去来辞》显然更着墨于未来田园前景的追梦与实践,于是在陶赋田园风景之铺陈中,全然不见张赋文中挥之不去的忧谗惧祸、仕宦梦魇等;反之,读者在陶赋中触目可见此起彼落的田园乐土观照,例如上引张赋田园风景中因触矢贪饵而招危取祸的鱼鸟困境,在《归去来辞》中则一一翻转为鸢飞鱼跃与怡然自得的乐园风景,例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1] 460}。

由此观之,同以归田命题的张赋与陶赋,两者主要体现书写交集外的异趋旨趣,并映现出前者仕途回首之忧患意涵、后者田园追梦之救赎意涵的对照意涵。如是形似神离的归田书写,亦进一步印证陶渊明“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1] 76}的最终人生定调,适与张衡未尝就此归田,并仍徘徊仕途的人生轨路形成反差,从而见证陶渊明《归去来辞》超越张衡田园蓝图基本旨趣之外的归田地图意涵。同时这一归田书写与变创取向,主要映现在陶赋对于田园乐土归返历程的铺陈与恐人生迟暮的时间焦虑上,这尤为关键。

陶渊明《归去来辞》与其先行典范张衡《归田赋》,固然在辞赋上前后辉映,并形塑归田书写系谱的传承关系,但就“归田”主题的论述取向而言,张赋主要集中体现源自仕途忧患下的归田召唤与精神隐喻。因此,张赋的风景铺陈大体呈现为纲挈目张、略陈梗概的田园构图;相形之下,陶赋的风景铺陈则着力于归田历程中之前后串联与更相迭代,俨如一幅深富于迷途航道意涵的归田地图,因此,《归去来辞》弥漫着此起彼落与前呼后应的身体移动相关叙写,例如:

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扬,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

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1] 460-461}

赋篇前后鱼贯者,即为归田之路的出发、转折与完成,其中既不乏可以身体力行,并富于耕读气息的田园生活规划;同时,其间又不断结合自我对话与文化辩证的相关叙写,作为前述归田行动及其身体践履的情志诠释,从而展现内在的文化依据与心灵地图,例如: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

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1] 460-461}

此外,陶渊明《归去来辞》的归田地图意涵,除了体现在归返历程与终极文化归宿的历历如绘外,亦复映现对于归田人生付诸实践的迟暮忧患及其时间焦虑,例如:

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

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1] 460-461}

借由上述《归去来辞》的文本脉络,与张衡《归田赋》的书写对照,不难发现张衡与陶渊明在归田论述

的交集与异趋,而这两篇赋在田园生活蓝图的文化原型上大体如出一辙,其中张赋主要作为仕宦困境的文化隐喻,基本上并非关注于实际归田人生的身体力行与重新实现,相对而言,陶氏《归去来辞》则更着意于归田行动的经营规划与自我确认。因此,《归田赋》之于张衡的创作意义,主要在于一种向传统隐逸文化取经的仕宦困境隐喻,并且赋篇中经纬铺陈的田园风景,终究是一幅遥不可及的梦幻蓝图与情志转换,却未必具备陶渊明历经宦海迷航,从而以身体行动重返田园的人生定调与心灵指南。由此观之,张衡《归田赋》以未来蓝图为书写旨缔的田园文学铺陈,迄至陶渊明《归去来辞》已然加以变创转化,并超越张赋田园蓝图的基本意涵,更进一步赋予《归去来辞》蓝图与地图的双重文化意蕴。这一同中有异且虚实对照的论述取向,复与两人在此后的仕宦场域中,仕、隐互殊的人生抉择若会符契,其中张赋缘自仕宦困境及其焦虑的蓝图隐喻,诚然与陶赋毅然断绝仕途、进而付诸践履的归田地图旨缔,彼此形似而神离。

三、归田谏书《感士不遇赋》的圣贤殷鉴与归田讽谏

陶渊明以《归去来辞》宣告其重返田园并绝意出仕的最终人生定调,在此后创作的田园诗歌,如《归园田居》、《饮酒》、《咏贫士》等组诗系列,皆一一成为其经典代表之作。而综观陶渊明辞官彭泽、重返田园时期的作品固然不胜枚举,然就文类而言,《感士不遇赋》则成为作者此一时期的唯一赋作。从《感士不遇赋》的命题文字而言,固然无法据以略窥此赋与前引作者《归去来辞》或《归园田居》等诗文在主题命篇上所明白揭示的归田主题,然而作为陶渊明最终归返田园时期的唯一辞赋,《感士不遇赋》可视为其晚期归田生活中感慨遥深的重要情志示现。因此,此赋对于重新审视作者此一时期的情志脉动及其心灵图景,显然是深具参考价值的重要文本依据。

从汉魏六朝辞赋的“士不遇”书写系谱来看,陶渊明撰于最终归田阶段的《感士不遇赋》除了可资以观照其归田心境外,借由此一书写系谱的沿波讨源,得以洞鉴其中作者意图透过汉赋中“士不遇”书写的拟古与续衍,回首平生由仕宦折返归田的心路嬗变历程。因此,《感士不遇赋》对于绝意仕途并由此定调归田人生的陶渊明而言,既是一则归田心境的自我纪录,亦是一面古今圣贤“士不遇”典故的历史回顾。于是《感士不遇赋》的命题对于终以归田安身立命的作者而言,无疑同时涵摄历史殷鉴与士人讽谏的双重文化意蕴。

陶渊明《感士不遇赋·序》自述撰写缘起谓: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赋》,司马子长又为之。余尝以三余之日,讲习之暇,读其文,慨然惆怅。夫履信思顺,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己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故夷、皓有安归之叹,三闾发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年,且瞬息已尽;立行之难,而一城莫赏。此古人所以染翰慷慨,屡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导达意气,其惟文乎?抚卷踌躇,遂感而赋之。^{[1] 431}

此篇序文的主要旨趣,显然聚焦古代圣贤之士与时不遇,往往寓托情志于文章之悲叹,其中又着重指陈“真风告逝”的世变背景下,“怀正志道之士”的“已矣之哀”,与“洁己清操之人”的“安归之叹”。然而,无论序文中所列举的三闾大夫屈原或伯夷、商山四皓等辈,虽有仕隐潜濯之别,却都无可避免地必须共同面对“已矣之哀”下的“安归之叹”,换言之,就《感士不遇赋·序》的行文旨趣而言,二者应是互文见义且相辅相成。由此观之,作者陶渊明意图借由古代圣贤人物“士不遇”的历史群相,指陈“真风告逝”的世变情境下,无论是立志“兼济天下”或“独善其身”的“怀正志道”与“洁己清操”之士,往往殊途同归地走向山水田园,作为其安身立命的终极人生归宿,这适如其正文首段开宗明义所主要揭橥的归田论述:

或击壤以自欢,或大济于苍生。靡潜跃之非分,常傲然以称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山巖巖而怀影,川汪汪而藏声。望轩唐而咏叹,甘贫贱以辞荣。^{[1] 431-432}

由此可见,作者意图借由古代“士不遇”的圣贤群相之历史借镜,论述归田在真风式微的世变浪潮下,俨然成为古代圣贤仕宦海终极的情志出路与心灵归宿。于是沿着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由序文揭示迄至正文首段阐释的书写脉络,得以略窥作者意图借由历史上圣贤之“士不遇”的回顾与陈述,为其《归去来辞》的归田宣誓及其践履,寻找历史依据与文化脚注的书写策略,换言之,若从表层的命题旨趣加以审视,似乎无所关涉于作者《归去来辞》与《归园田居》所联袂演绎的归田论述,然而透过上述序文与正文

为首的书写脉络,其实渐次透露出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与《归去来辞》之互为表里,并且进一步可以相互定义的归田论述。

《感士不遇赋》作为陶赋归田论述的历史依据与文化脚注,亦复可从赋末归旨于告别仕途与归返田园之论述获致印证:

苍旻遐缅,人事无已。有感有味,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缁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1]433}

撰于陶渊明《归去来辞》之后的《感士不遇赋》,从其正文首段及旨趣归结观之,诚然可以视为作者归田论述的重要结构之一,更与《归去来辞》彼此呼应、互为表里,为陶渊明归田情志及其人生终极定调提供了另一值得关注的脚注。

以往学界对于陶渊明辞仕归田的主要理由,基本上不外依据其在《归去来辞·序》中的自我告白: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缁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命篇为《归去来兮》。^{[1]460}

其中家境清贫与质性自然诚为其中两大关键,故谓“饥冻虽切,违己交病”。然而在此之外,作者又谓“于是怅然慷慨,深媿平生之志”。作者于文中欲言又止的“平生之志”究何所指?几乎可谓无人问津,但其中国亦不乏学者注意此赋对于陶渊明归田人生深具“无成之悲”的抒情意涵^[7]。由此观之,《感士不遇赋》对于掌握作者的心灵世界及其归田情志,显然应具有不可忽略的重要意义,并且值得重新加以审视。

“家贫”是陶渊明几番辗转游移于仕宦与归田的重要变动元素,这攸关其基本的生存所需;至于“质性自然”问题,则属于才性取向,这两大牵动作者的原因,本质上非主要源自于士人的文化道统问题。因此,《归去来辞》固然是陶渊明归田人生的终极定调及其宣誓,然则序文中所主要铺陈的“家贫”与“质性”缘由,显然不仅不够全面,并且未见鞭辟入里。由是观之,《感士不遇赋》若从其归田论述这一重大创作旨趣言之,应可视为陶渊明《归去来辞》的续衍书写,这俨然构成其辞赋归田论述之姊妹篇章。

《感士不遇赋》的创作意义,主要系乎此作品旨趣正是植基于其《归去来辞》的“怅然慷慨”与“平生之志”,此一尚未正式演绎的论述主题,除了作为汉魏六朝辞赋史“士不遇”书写系谱的重要里程碑之外,此赋最重要的价值则体现在揭示了陶渊明最终宣告归田不仕的深层理由,而在此一深层因素背后,其实是渊源于传统士人的文化承担及其历史省思;易言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所攸涉的文化根本主题,正是中国历史上士人群体基本上几乎难以避免的处身于道统与政统之间的传统困境^[8],并且这一渊源流长的士人文化困境,又因结合作者身处六朝世变之际的非常政治处境,从而借由“士不遇”此辞赋传统主题的再现与复制,承传并完成其士人文化论述,并且与其《归去来辞》前后呼应、互为表里。由是观之,《感士不遇赋》适为陶渊明的归田论述提供了一则士人面对道统与政统之际生命困境的重要脚注,于是对于作者而言,借由历史上作为士人典范之圣贤人物的回顾与省思,便显得极为必要与迫切。

撰于《归去来辞》之后的《感士不遇赋》为陶渊明最终的归田情志提供了一则源自士人道统承传与历史审视的重要内在文化依据,并且与其《归去来辞》所谓“质性自然”与“平生之志”等等归田缘由,亦即攸关作者自我人生及其精神困境的主观因素,形成相辅相成与互为表里的归田之志的经纬交织二重论述。于此之下,《归去来辞》便宛如一张归田的心灵地图,同时也是一幅将来归田生涯的人生蓝图,相形之下,《感士不遇赋》将历史上圣贤人物列入“不遇”的群体及其系谱,便化身而为一部陶渊明定调归田人生的历史谏书,从而成为一本深具史鉴意涵的归田启示录,因此《感士不遇赋》旨趣乃归结于:

苍旻遐缅,人事无已。有感有味,畴测其理?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缁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1]434}

就陶渊明《感士不遇赋》的书写系谱而言,固然源自先秦两汉以来以屈原与董仲舒、司马迁为主要代表的辞赋家“士不遇”主题书写,将之与张衡《归田赋》为代表的辞赋归田书写合流,并且将其导向以文学为载体的归田论述之列,从而借由辞赋铺陈的文体特性,建构出隶属于作者自我的古今圣贤“士不遇”的历史文化谱系,其中一一揭橥于序文中伯夷叔齐、三闾大夫屈原、商山四皓之外,正文中作为其归田情志的深层依据及其鉴戒,尚踵事增华地加以铺采摛文,并指陈时移世变之下因“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网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彼达人之善觉,乃逃禄而归耕”的作者归田观照,于是《感士不遇赋》中

以先秦两汉历史上圣贤人物为中心的“士不遇”群体,遂此起彼伏落地成为陶渊明笔下古代“士不遇”文化系谱的主要组构分子:

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独只修以自勤,岂三省之或废。庶进德以及时,时既至而不惠。无爰生之晤言,念张季之终蔽。愍冯叟于郎署,赖魏守以纳计。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悼贾傅之秀朗,纤远轡于促界。悲董相之渊致,屡乘危而幸济。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漓以洒袂。……夷投老以长饥,回早夭而又贫。……何旷世之无才,罕无路之不涩。……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商尽规以拯弊,言始顺而患入。^{[1] 432-433}

陶渊明借由汉代董仲舒、司马迁等前贤辞赋的拟古书写基础,叙写古代圣贤“士不遇”困境,并且条分缕析地约略归纳下列类别:

- (一)“虽仅然于必知,亦苦心而旷岁”的迟暮感及旷日发时,并举汉代张释之、冯唐为例。
- (二)“感哲人之无偶,泪淋漓以洒袂”的不遇知音与众口铄金,并举贾谊与董仲舒为例。
- (三)“虽好学与行义,何死生之苦辛”的君子穷困与天道不亲,并举伯夷、颜渊为例。
- (四)“奚良辰之易倾,胡害胜其乃急”的才士路涩与小人谗害,并举李广、王商为例。

由此观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主要借由先秦两汉前贤的“士不遇”观照,先秦古往今来“奉上天之成命,师圣人之遗书。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好学与行义”的士君子“不遇”困境,从而获致“苍旻遐缅,人事无已。有感有味,畴测其理”的历史经验及其自我借鉴,进而导出“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缁袍之为耻。诚谬会以取拙,且欣然而归止”的归田旨趣;换言之,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主要依据秦汉历史与辞赋等历史文献的“士不遇”载录,进一步结合作者的历史回顾与当代省思,重新予以论述与整理,并从中得出重要脉络条理,作为作者终究辞仕归田的历史文化深层依据,并从中获致启悟。于是《感士不遇赋》不仅是陶渊明归田人生的一篇历史启示录,就其前此数度游移并转换于出仕与归田之间的人生地图而言,无疑亦复兼具历史借鉴与自我讽谏的深层书写意蕴,故就其最终的归田情志定调而言,《感士不遇赋》俨然成为一篇以“士不遇”为宗旨的归田谏书,不仅深具关键意义,并且应是作者以辞赋演绎归田论述的重要文化脉络与情志关键。由此观之,陶渊明《归去来辞》与《感士不遇赋》二者彼此经纬交织的归田论述,分别展现出不同的文化意蕴,前者主要书写意涵乃在作为其中的心灵地图及未来蓝图;后者则化身为历史启示录与“士不遇”谏书,从而铺陈其归田论述中“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的主要文化构图。

四、系谱·地图·谏书:陶渊明辞赋所映现的归田文化构图与人生对话

陶渊明以《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为代表的田园诗歌,向来成为后世读者认识作者其人其文的主要文本依据,却也因此容易忽略在创作数量上相对有限而稀少的辞赋作品。然而就作者陶渊明而言,于此两种文体之间的书写关系及其意义,并非仅是借由诗歌与辞赋的文体特性产生书写上的转换与变化,从其田园书写之时机与意蕴而言,《归去来辞》以赋笔铺陈所展现的预拟性与梦幻性取向,显然迥异于其《归园田居五首》、《饮酒二十首》等田园诗歌经典的当下性与现实性叙写^{[5] 60-68},从而在陶渊明田园诗歌与辞赋之间,俨然呈现一种互为表里且经纬交织的情志网络,并且于此梦想与现实或快乐与焦虑兼容并蓄的真实田园情境里安身立命,就后世读者亟欲深入作者陶渊明田园生活背后的真实心灵世界而言,其诗歌与辞赋文本显然皆不可或缺,并且呈现一种互涉又互补的紧密依存关系。若欲掌握陶渊明真实而完整的田园心灵世界,除了阅读其丰富田园经典诗歌外,数量微少的辞赋文本仍然具有无可取代的阅读价值及解读意义。

基于上述陶渊明诗歌与辞赋等不同文体之间的对读与整合,诚然颇有助于观照其深藏于田园文学背后的作者身影及其内在心灵,由此观之:

(一)辞赋在陶渊明的田园文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关键意义,其中固以《归去来辞》为主要代表,然而就中国归田书写的文类流变历史而言,辞赋之重要性基本上应该超越诗歌之上^{[5] 49-59},因此考察《归去来辞》的文学渊源及其书写系谱,诚然别具独特的意义;换言之,就其辞赋的归田书写源流而言,《归去来辞》显然承传自汉赋以来以张衡为首的归田辞赋系谱,适同作者在另一篇以归田为旨趣的《感士不遇赋》序言中明白揭示其创作上渊源于汉代董仲舒《士不遇赋》、司马迁《悲士不遇赋》般。由此可见,陶渊明以

辞赋所形塑的归田论述,其中显然别具深刻文体与文化意涵,从而映现辞赋系谱在其归田论述中所扮演的重要文化构图意义。

(二)《归去来辞》不仅成为陶渊明辞仕归田的梦幻乐园及其预拟蓝图,同时也是作者历经人生数度往返仕、隐之途的终极定调与情志地图。于是借由赋笔铺陈的《归去来辞》,其中由告别仕途所展开的归田地图,除了沿途的风景导览外,更借由田园空间的辗转与转换,渐次浮现作者由身体到心灵乃深入至文化国度的田园归返动线,其中历历如绘所勾勒出作者归返田园之路的身体行动与心灵对话,俨然成为作者以赋体所彩绘的田园人生蓝图及其心灵地图。其中作为陶渊明归田论述另一部分的《感士不遇赋》,由于篇末即归旨于田园归返,因此显然成为与《归去来辞》相互连结的重要归田地图的另一组成,换言之,《感士不遇赋》的书写,就作者之归田情志而言,其终极旨趣正为其《归去来辞》中之田园蓝图,提供另一则源自士人文化,同时又是辞赋另一书写系谱的历史原点。其中所以由“士不遇”适往“归田”的重要理由,不完全是源自作者陶渊明“质性自然”的真实性情,同时也是一种借鉴于士人历史经验法则的文化解读,其间的因果关系与辩证结果,既是涉及陶渊明个人心灵,同时又攸关历史世界,成为在此一兼容并蓄观照下,所勾勒得出的田园蓝图与文化地图。

(三)陶渊明既是借由个人情志与历史世界间的文化对话,从而得出由“士不遇”通往“归田”的士人归田地图,然则其中借由古代圣贤人物“士不遇”的历史巡礼,对于作者而言,既是一部深具史鉴意涵的古代圣贤启示录,同时也是一篇透过历史教训及其经验法则,并且作为与作者自我展开内在在精神对话的一篇人生谏书。如是类似的历史阅读与古今对话,其实也经常映现在陶渊明的诗歌中,如《读史述九章》、《咏贫士七首》、《咏三良》等,然而这些向来被作为咏史诗歌文本阅读意义之诗作,无法像《感士不遇赋》般借由辞赋历史上的“士不遇”书写系谱加以集中体现出来,尤其更无法如《感士不遇赋》篇末曲终奏雅地导向归田的终极旨趣,自然也无法如《感士不遇赋》般水到渠成地连结并通往作者《归去来辞》中的田园世界。《感士不遇赋》作为陶渊明归田地图上的重要情志摆渡及其转换驿站,本质上也源自《感士不遇赋》其深刻却又隐微的归田谏书意涵,使它化身为作者归田论述中兼具历史启示录与人生谏书的重要书写文本。于是陶渊明《归去来辞》首段开宗明义揭示“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应可据此为其出入仕、隐的人生过往,提供另一则源自“士不遇”历史的谏书文本与文化脚注。

由上观之,陶渊明运用辞赋文体,并实际借由《归去来辞》与《感士不遇赋》两篇重要文本所展开的归田论述,就其外在型式的辞赋文体特质,臻至辞赋的书写系谱,及其内在的书写文化,例如其中包括时空铺陈、历史巡礼、人物缅怀、文化追忆、当代谏讽等等,皆一一映现在陶渊明辞赋之归田论述里,因此借由攸关陶渊明辞赋中归田论述之历史系谱、文化地图与人生谏书等三类文化范畴的重新审视,我们得以重新观照并发现其中所蕴涵的深层文化底蕴,并由此展现辞赋书写在陶渊明田园文学世界中独特的文体、文化及其人生对话意涵。

[参考文献]

- [1] 袁行霈.陶渊明笺注·卷5[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2] 张震泽.张衡诗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3] 许东海.田园与乐园:汉魏六朝辞赋中的田园书写及其乐园论述[M]//另一种乡愁:山水田园诗赋与士人心灵图景[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4.
- [4] 廖国栋.从“士不遇”到“归去来”:汉代赋家对于京城的趋附与偏离[M]//第三届国际辞赋学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国立政治大学文学院,1996.
- [5] 许东海.归返·梦幻·焦虑:论陶、柳辞赋的归田书写及其文类流变[J].汉学研究,2004,22(1).
- [6] 许结.张衡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7] 王国瓊.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论析[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9.
- [8]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熊显长]